

· 文学史研究丛书 ·

屈原及楚辞学论考

常 森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· 文学史研究丛书 ·

屈原及楚辞学论考

常 森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屈原及楚辞学论考/常森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6.6

(文学史研究丛书)

ISBN 978-7-301-26477-5

I. ①屈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屈原(约前340~约前278)—楚辞研究 IV. ①I207.2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9682号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书 名 | 屈原及楚辞学论考
QU YUAN JI CHUCIXUE LUNKAO |
| 著作责任者 | 常 森 著 |
| 责任编辑 | 徐 迈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301-26477-5 |
| 出版发行 | 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@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电子信箱 | pkuwsz@126.com |
| 电 话 |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6467 |
| 印 刷 者 | 北京大学印刷厂 |
| 经 销 者 | 新华书店 |
| | 880毫米×1230毫米 A5 20.125印张 523千字 |
| |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76.00元 |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,电话:010-62756370



丛书主编：陈平原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“文学史研究丛书”总序

陈平原

中国学界之选择“文学史”而不是“文苑传”或“诗文评”，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，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。从文学观念的转变、文类位置的偏移，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，“文学史”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。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，“文学史”在 20 世纪的中国，产量之高，传播之广，蔚为奇观。

从晚清学制改革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展开，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，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。在此过程中，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：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（1904）还只是首开记录，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，如姚永朴的《文学研究法》、刘师培的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和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、黄侃的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、吴梅的《词余讲义》（后改为《曲学通论》）、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胡适的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和《白话文学史》、周作人的《欧洲文学史》和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，以及俞平伯的《红楼梦辨》、游国恩的《楚辞概论》等。这些著作，思路不一，体式各异，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。

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，并无“惟我独尊”的妄想，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；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，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。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，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

样,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,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。

在很长时间里,人们习惯于将“文学史研究”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(或教材式的“文学通史”),其实,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,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,尽可不必画地为牢。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,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,也都各具面目,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。

那是一个“开天辟地”的时代,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,但生气淋漓,至今令人神往。鲁迅撰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序言》,劈头就是:“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。”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:“有之,自鲁迅先生始。”当初的处女地,如今已“人满为患”,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?胡适撰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,以历史眼光、系统整理、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,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。今日中国学界,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,早就超越胡适的“三原则”,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?

当初鲁迅、胡适等新文化人“整理国故”时之所以慷慨激昂,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。今日中国,能否有此迹象,不敢过于自信,但“新世纪”的诱惑依然存在。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,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。

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,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,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。在20世纪中国,相对于传统文论,“文学史”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。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,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,如何洗心革面、奋发有为,值得认真反省。

反省之后呢?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——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人的积极参与。

引言

2012年3月,拙著《屈原及其诗歌研究》(以下简称《研究》)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所有了解该书的细心的朋友都会意识到,关于屈原和楚辞,笔者另外有很多话并未在书中呈现,这暗示了其他相关著论的存在。事实正是如此。笔者另外有一个安排,即以本书研讨屈原及楚辞学的一系列奥秘。因此,以《屈原及其诗歌研究》与本书合观,笔者对屈原与楚辞学的阶段性探讨才算完整——当然也还只是阶段性的。说实话,有点儿对不住《研究》一书的读者朋友。因为对该书而言,本书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乃是前提性的。

《研究》一书的引言中有不少话放在这里交代其实更合适,只因它先于本书出版,所以勉强放到了那里。重复也没有太大的必要,本书之引言更想说点儿“题外话”。

不管大家承认与否,这都是一个浅阅读盛行的时代,甚至学者著书立说都难免此弊。很多人翻翻一本书的引言或绪论,顶多再翻翻结语(后记一般会浏览一下,因为那里往往有一些跟学术无关却有趣的信息),就觉得已经做了完整意义上的阅读了。我们不能说这个时代学风多么浮躁或者多么急功近利,因为同时有一大批并不浮躁,并不急功近利,踏实、严谨、创新的学者在。然而的确,这个时代热衷于制造“大师”,真学问则相当匮乏。多数人推动和追逐的都只是浅阅读(与物质利益或市场不无关系吧),叫人安安稳稳坐下来认认真真读一本

书,还是相当困难的事情。更糟糕的是,狭隘的功利性算计已瓦解了很多人对真学问的尊重。浅阅读当然有其好处,即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“读”很多,可以在张口或下笔时掉书袋卖弄渊博;其坏处则是“读”了很多,却跟未读没有太大差别,往往只是断章破句、敛聚了不少谈资而已。古人好言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这样说至少有一个前提,即非同一般的深度阅读。对半部《论语》的深度阅读,其价值可能超过对几百本故典的浅阅读。

张潮《幽梦影》云:“少年读书,如隙中窥月;中年读书,如庭中望月;老年读书,如台上玩月。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。”^①不少人觉得这话深知读书痛痒。然而实际上,阅读之所得何尝只关乎阅历呢?就读书言,阅历这东西,没有固然不行,有了也不一定行。多少人曾经沧海,饱谙世事,去正经读书却了无所获。读书,有了阅历,最起码还要有会心。大浪淘沙千百年,历史给我们留下为数不多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响当当的经典。它们都需要深度阅读,都需要别有会心。《庄子》和屈原辞均是极杰出的例子。它们都很难读。《庄子》难读,是因为它不像《论》《孟》《老》《韩》那样正襟危坐谈学问,它是奇诡谬悠的诗化的哲理。作为诗人兼学者的闻一多就把《庄子》当诗读。他说:“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。……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。”^②屈原辞难读,是因为它们是非同一般的诗,而且并非《诗三百》那种“极质正的现实文学”^③。就是说,庄子——连同他缔造与影响的后学——和屈原都异想天开,都喜欢“藉外论之”,指东打西,言在此而意在彼,都善于营

① 张潮《幽梦影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,第39页。

② 闻一多《庄子》,孙党伯、袁霁正主编《闻一多全集》第九卷,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,第8页。

③ 参阅梁启超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,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七十二,中华书局1989年版(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),第81页。

构迷宫般繁复奇谲的形式,同时其思维都富于开创性、跳跃性和暗示性,我曾因此称屈原为极深刻的“形式主义”者^①。读他们的文与诗,见山不是山,听风须知雨,无沉潜,乏会心,只能掉进他们营构的“陷阱”,买其椽而还其珠。古今学人落此弊者不知凡几。举一例来说,若无会心,何以发现《九章·哀郢》与《天问》《招魂》的内在关联呢?而不把握这种内在关联,又何以有效诠释相关文本呢?

做学问还有方法问题,通常称为“路数”。路数不对,只会益行益远、益远益偏。一如练武功,路子歪了,用功越深,后果越重。笔者做学术,一直强调对方法的关怀,自己在提出和解决问题时,也往往伴随方法上的反思。

吕思勉先生评今古治国学者云:“昔人读书之弊,在于不甚讲门径,今人则又失之太讲门径,而不甚下切实功夫:二者皆弊也。”^②钱穆先生说:“当知做学问本来是要工夫的,没有不花工夫的学问。诸位每做学问,好问方法,做学问最大第一个方法就是肯花工夫。”^③吕先生说得相当中肯,钱先生说得也极透彻,不过肯下功夫之后,仍有一个方法问题。对方法的关怀其实是做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。笔者在著论中谈方法,务求立足于具体和切实的研究,水到渠成,绝不放空。

2005年11月,我在台湾辅仁大学召开的“第四届先秦两汉学术国际研讨会”上发表论文,探讨屈作“女求男”“男求女”模式及两者间的同义转换,认为它们在屈作中是等值的艺术符

① 参见拙著《屈原及其诗歌研究》第三章“‘寄情寓言’以及屈原的‘形式主义’”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。

② 吕思勉《经子解题》自序,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,第7页。

③ 钱穆《中国史学名著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,第5页。

号^①。当时引发了一个基于女权主义的追问。男权女权的理论视域当然十分重要,可具体到屈原研究,仍要看怎么运用。屈作“女求男”“男求女”模式的转换有极深刻的现实基础。被追求者指涉国君;追求者为屈原之化身,而时为女性,时为男性。屈原艺术化为男女关系模式中的男性角色显得合情合理,极其自然。一方面,屈原本身是男性;另一方面,高辛以玄鸟凤凰为媒理求美女简狄,是他极深刻的文化记忆,曾以不同姿态和形式出现在《九章·思美人》《离骚》《天问》等辞作中,对他铺采摘文的形式意图发挥着塑型作用。可是当屈原用男女关系模式来表现自己被疏遭弃时,他只能取女性角色,因为那一时代大概没有被女性抛弃的男性,看看《诗三百》中《卫风·氓》《邶风·谷风》等一批弃妇诗就很清楚了。在这一表达模式的现实规定性上,男权女权问题无疑存在,而且非常关键。但这显然不妨碍“女求男”“男求女”在屈作中充当等值的艺术符号。

从男权女权立场上追问屈作“女求男”“男求女”之模式,显示了极好的问题意识,促使我进一步思考,也进一步收获。需要防备的,是那些超出学术层面的过度敏感。曾几何时,有学者认定在《论语》一书中,“‘人’与‘民’……是不可混同的两个阶级;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,在政治领域中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,因而其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内容与形式,亦复互不相同”;坚称“《论语》所说的‘人’与‘民’,相当于一般奴隶制社会的两大阶级:‘民’是奴隶阶级,‘人’是奴隶主阶级”^②。这种罔顾事实的“一刀切”隐藏着超出学术界

① 拙著《屈原及其诗歌研究》对这一问题有更充分的论述,参见该书第二章第二节“屈作‘男女关系’模式”。

② 赵纪彬《释人民》,见所著《论语新探》,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,第7、26页。

域的过度敏感,后来有不少学者予以廓清^①。屈原研究领域也有类似的敏感。比如,有学者看《离骚》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“怨灵修之浩荡兮,终不察夫民心”等句,见有“民生”“民心”诸字眼,便坚称屈原为“民本思想者”^②。屈原确有民本思想,但拿这样的诗句来支持自己的判断却并不准确。单就《离骚》而言,“民”字凡五六见,实均取常见义——“人”;而“哀民生之多艰”“终不察夫民心”之“民”字,又是取“人”之义而指言自己。人、己本来相对,以“民(人)”指己,此二语正是其例^③。

拙著《屈原及其诗歌研究》给屈原作品以极高的评价。但屈原只是笔者的研究对象而非信仰,笔者不会给予他违背学理的评鹭,不会因为自己研究屈原就捧屈原,说他好说他坏,都是因为不得不说。真实、恰如其分地呈现屈原的特质和价值,是笔者更重要的追求,也是屈原研究应有的更重要的关怀。

近几年,笔者受命参加袁行霈先生主持的一个古籍整理项目,承担的任务是《墨子》新校新注。曾有朋友善意地提醒,注释《墨子》一定要注意墨子及其后学的立场,他们是儒家的对立面,总跟儒家唱对台戏。这一点的确非常重要。但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做法,即不预设立场,不预先抱定一种固化已久的认知,不管这种立场和认知多么符合大家的常识。历史上的很多成见都有欺骗性。比如,可能从《荀子》产生之日起,它就被放到

① 孙钦善曾予以详细的反驳,见所著《论语本解》附论“《论语》和孔子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影响、现实意义”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,第306—311页。

② 郭沫若《历史人物·屈原研究》,《郭沫若全集》历史编第四卷,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,第91页。

③ 具体请参阅本书第一章第三节“第二次被放及此期作品考”。

子思、孟子的对立面,因为《非十二子》篇对思、孟五行学说有极尖锐的批评。所幸湖南长沙马王堆之帛书《五行》与湖北荆门郭店之简书《五行》相继出土,拿来与《荀子》比对,可以发现《荀子》有很多重要思想深刻地承继了《五行》学说^①。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思维审视对象,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发现,会发现历史的真面目。面对屈原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一开始就抱定那些固化已久的认知,比如“在楚言楚”等,对我们的研究不会有任何益处。

依传统做法,同时也为了节省篇幅,本书引用古籍一般只随文注出书篇名;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,“王逸章句”“洪补”“蒋驥注”“毛传”“郑笺”等所关联之《楚辞》《诗经》注本之类,则径直省略。除正文特别说明者以外,各书所用版本均列为参考文献,读者朋友可以循察。

以上就算是引言吧。其实,引言之为“体”,最大的好处就是允许有较自由的空间,让作者说些不甚相干的话。

^① 具体论证,请参阅拙作《〈五行〉学说与〈荀子〉》,刊载于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1期;以及《从〈五行〉学说到〈荀子〉:一段被湮没的重要学术思想史》,收入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》,齐鲁书社2013年版。

目次

引言 1

第一章 生平与时代:屈原作品的现实触媒 1

- 第一节 从“王甚任之”到被疏 8
- 第二节 从第一次被放到重获起用及此期作品考 30
- 第三节 第二次被放及此期作品考 58
- 第四节 屈原之大时代 118
- 余论 133

第二章 屈原之人生追求模式 138

- 第一节 屈原人生追求之三层面 138
- 第二节 屈原人生模式之双向性 150
- 余论 163

第三章 屈作之历史视野 165

- 第一节 屈作历史视野中的楚史要素 165
- 第二节 “三后”或“三五”:人君之楷式 181
- 第三节 “吉故”:明君贤臣之遇合 204
- 第四节 人君的反面教材 217
- 第五节 屈子同类及同命运者 246
- 第六节 其他要素 284
- 余论 313

第四章 屈原天命观及其解构	328
第一节 “皇天无私阿兮,览民德焉错辅”	333
第二节 “天命反侧”	337
第三节 “皇天之不纯命”	348
余 论	356
第五章 屈原:观照儒学传播与影响的重要个案	358
第一节 屈作与传世儒典之关联	365
第二节 屈作与《五行》学说	394
余 论	402
第六章 《招魂》: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	408
第一节 宋玉代言说之空洞及迂曲	421
第二节 《招魂》结局与下招目的之背离	425
第三节 “为招之术”:《大招》作为关键参证	430
第四节 序乱辞难点考释:以主体行为及特征为核心	437
第五节 既有研究之问题以及《招魂》本意	445
余 论	455
第七章 论《远游》非屈原所作及其创作时期、历史渊源与实质 ——以仙观念、道学背景、文学史及思想 文化史线索为核心	457
第一节 《远游》仙观念及其与核心比照系统的 根本歧异	463
第二节 《远游》道学根基及其对屈作核心 比照系统的背离	473
第三节 《远游》创作时期:基于文学史线索的论析	486
第四节 《远游》创作时期:基于思想文化史 线索的论析	566

余 论	583
-----	-----

结 语	585
-----	-----

附 录 论《离骚》篇题之义	594
---------------	-----

书名篇名人物索引	603
----------	-----

主要参考文献	619
--------	-----

后 记	625
-----	-----

第一章 生平与时代：屈原作品的现实触媒

屈子去后，千百年时光已经过去，但其生平与创作仍有很多事项未弄清楚。他究竟创作了哪些作品，学界向有争议；他在哪些历史阶段、因何种现实触媒完成自己的创作，更是一片蒙昧。有学者期望新出土的文化遗存能照亮历史的巨大黑洞。我们确实有很多重要的出土发现，可要说哪些跟屈原有切实的关系，需作极仔细的论证。比方说，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重要典籍及其他文化遗存，有学者据墓中之物漆耳杯铭文、鸠杖等，论定墓主就是屈原。这不过是想当然而已，已有专家作了驳正^①。屈原的人生结局有其特殊性，要找这样的文化遗存，希望显然不大。

在现有条件下，要梳理屈原生平及创作的基本事实，屈作本身是十分重要的依据。汪瑗注《九章·思美人》“开春发岁兮，白日出之悠悠”一章，尝云：“屈原之大节，虽见于《史记》，而中心之委曲，行事之始终，兴趣之幽眇，人品之佚宕，其详则不可得而闻矣，尚赖《楚辞》诸篇考见其一二……”当代楚辞学家金开诚说：“屈原

^① 关于郭店一号墓出土的情况，参阅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《荆门郭店一号楚墓》一文（刊载于《文物》1997年第7期）。高正主张该墓墓主为屈原，参见所著《郭店竹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定位：兼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》（刊载于《中国哲学史》2000年第2期）。周建忠予以反驳，参见所著《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：兼论屈原生平研究》（刊载于《历史研究》2000年第5期）。

的辞作,里面有不少材料,可以说明屈原的经历。”^①除屈作本身堪作依据外,战国至汉代的相关著述是不可忽视的。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:一为历史记述,如汉初史家司马迁所撰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《楚世家》等。二为文学作品,如传世《楚辞》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,汉初贾谊之《吊屈原赋》、东方朔之《七谏》等。三为叙记传注,如汉初刘安之《离骚传》、西汉末刘向之《新序·节士》、东汉初班固之《离骚序》以及东汉中叶王逸之《楚辞章句》等。

这些材料中,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对了解屈子生平尤其重要,然该传自身内容有含混、龃龉处,后人对其解读又存在很多问题,以至于产生了一些对屈原和楚辞研究极为致命的结论,这里不能不给出简单的回应。

谢无量《楚词新论》提道:“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,见着廖季平。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《楚词新解》给我看,说‘屈原并没有这人’。他第一件说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是不对的,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连属,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,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,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《离骚》的时代。”^②《楚词新论》著于1922年至1923年间,“十年前”则当是1912年前,那时廖平

① 金开诚《屈原辞研究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,第45页。

② 参阅谢无量《楚词新论》,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,第12页。案:后来很多学者比如郭沫若等人即据此认定廖平《楚辞新解》为屈原否定论的滥觞,但也有学者予以驳斥,力证《楚辞新解》既未否定屈原的存在,又未否定《屈原列传》的真实性(参见黄中模《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》,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,第117—118页)。其实问题恐怕有更复杂的一面。郭沫若等人固然有误,但仅据《楚辞新解》来判断谢无量之说同样是一种误会。的确,《新解》不否认屈原的存在,惟认定传世楚辞多非屈原所作而已。该书之叙,劈头就说“《离骚》者,屈子之所传也”(该书凡例谓:“《离骚》篇名不可解,盖如古纬,为屈子所传,并非其自作。《离骚》为经作,亦如诸纬为弟子所传”),其指责太史公,也只是在“误以所传为自作,指为离忧,沉渊而死”等数事。但谢无量所记本非廖平书中之意,而是其口头陈述。廖平学术喜变,好自攻讦,其本人有四变五变之说,矜为合兴覆于一身,故其口头陈述亦未必奉持书中之意。就此而论,不管谢无量是否将廖氏其他书误记为《楚词新解》,这条记述都有重要价值。